

民族主義與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 「鄉土文學」： 一個文化(集體)記憶變遷的探討*

蕭阿勤**

摘要

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之後，在臺灣政治與文化不斷「本土化」的脈絡中，以黃春明、陳映真等人的創作為代表的鄉土文學做為七〇年代回歸鄉土潮流的代表，其出現與發展逐漸被視為臺灣文化朝向本土化變遷的起點。八〇年代之後，臺灣民族主義者述說的「臺灣文學史」中，鄉土文學——或者更廣泛的回歸鄉土潮流——被視為替具有臺灣民族主義傾向的「臺灣意識」之發展奠下基礎。在九〇年代臺灣的政治更自由化、歷經激烈的「統獨之爭」而民族／國家認同議題的公開論辯幾無任何禁忌的情勢中，臺灣民族主義者之間又發展出另外一種對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現象的理解，亦即認為鄉土小說家是中國民族主義者，而 1977 到 1978 年的鄉土文學論戰則是一場中國民族主義者之間的內訌與對峙。從八〇、九〇年代迄今，以本土、臺灣為重的取向，逐漸成為文化領域開展思考與決定行動時佔優勢的原則之一。在這種歷史發展中，上述臺灣民族主義者對七〇年代鄉土文學所建構的集體記憶，在臺灣文學史或文化史的認識上，似乎有逐漸取得優勢的可能。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全球化下的社會學想像：國家、經濟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臺北，臺灣大學社會學系、臺灣社會學社主辦，2000年1月15日），並曾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週二學術演講進行報告（2000年3月14日）。作者感謝研討會中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李丁讚教授的評論及兩次與會諸君的批評，這些挑戰使筆者獲益良多。同時也感謝投稿時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意見。原稿在第一節的概念與理論的討論部分，已依審查人的意見，做適當的刪節。然而由於篇幅所限，以及筆者某些不同的看法，因此未能將審查人一些另外的意見納入本文的討論。筆者希望再有機會針對這些意見做出回應與貢獻。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

本文運用文獻資料，一方面探討上述八〇年代之後臺灣民族主義者對鄉土文學的特殊理解如何形成，另一方面則回溯八〇年代之前，亦即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初起至「鄉土文學論戰」左右，一般——包括後來成為臺灣民族主義者的文學作家與評論家——對鄉土小說出現的歷史文化意義的認識。亦即本文在比較一群後來成為臺灣民族主義者的文學作家與批評家在八〇年代前後對鄉土文學的文化意義與歷史定位不同的理解，尤其是這些不同的理解與特殊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的關係，並且釐清其轉折的過程。

本文藉著這個歷史過程個案的分析，討論「集體記憶」的基本性質，指出所謂的集體記憶主要的構成要素，除了被認定與某一人群有關的過去經驗之外，更重要的是將意義賦予這些經驗的「參考架構」，亦即一個關於過去集體經驗的「敘事模式」。

本文的結論指出：民族主義意識型態的發展與關於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的集體記憶之間的密切關係，進一步顯示了「集體認同」與「集體記憶」兩者是「互相建構」的：它們是互相形塑而又互相限制的，因此也就是相互辯證的。本文並且認為：民族主義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做為一種認識過去的方式，往往受限於某種特殊的歷史演化論與目的論，因而經常忽略實際的歷史過程，或是以預設的歷史演進方向與可欲的歷史變遷結果做為解釋歷史發展的動因。最後本文也指出，民族主義與歷史研究及書寫之間的密切關係，是我們理解臺灣的過去時所必須深刻反省思考的。

關鍵詞：認同、集體記憶、民族主義、鄉土文學、臺灣文學、臺灣史

黃春明、陳映真等人創作的小說，在臺灣一九七〇年代「回歸鄉土」的文化潮流中逐漸受到重視，而被稱為「鄉土文學」。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之後，在臺灣政治與文化不斷「本土化」的脈絡中，鄉土文學做為七〇年代回歸鄉土潮流的代表，其出現與發展逐漸被視為臺灣文化朝向本土化變遷的起點。八〇年代之後，臺灣民族主義者述說的「臺灣文學史」中，鄉土文學——或者更廣泛的回歸鄉土潮流——被視為替具有臺灣民族主義傾向的「臺灣意識」之發展奠下基礎。在九〇年代臺灣的政治更自由化、歷經激烈的「統獨之爭」而民族／國家認同議題的公開論辯幾無任何禁忌的情勢中，臺灣民族主義者之間又發展出另外一種對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現象的理解，亦即認為鄉土小說家是中國民族主義者，而1977到1978年的鄉土文學論戰則是一場中國民族主義者之間的內訌與對峙。從八〇、九〇年代